

从“英雄主体”到“被动客体”：异化劳动与自我认同的消解

耿丽君, 杨 萍, 郭艳茹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3日

摘 要

孙悟空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代表, 其形象随着时代的变化有着不同的含义流变。从一开始的英雄本体“齐天大圣”, 再到如今反讽意味深重的表情包“吗喽”, 含义流变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主体精神图景的变迁。研究表明, 在数字资本重构劳动形态的时代,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疏离、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化, 合力催生了“被动客体”的精神境况。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角度来看, 青年通过“吗喽”话语进行的自我客体化叙事, 既是时代系统性异化的自我认同消解的产物, 亦是对主流成功学的象征性反抗。

关键词

孙悟空, 英雄, 被动客体, 自我认同

From “Hero Subject” to “Passive Object” Alienated Labor and the Dissolution of Self-Identity

Lijun Geng, Ping Yang, Yanru Guo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Received: June 8, 2026; accepted: June 30, 2026; published: July 13, 2026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symbol of China, the image of Sun Wukong has undergone different semantic transformations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From the original heroic embodiment “Great Sage Equal to Heaven” to today’s ironic meme “Malo”, the evolution of its meaning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ras core spiritual landscap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an age where digital capital

reshapes labor forms, the alienation between workers and their products, the alienation from labor activities, the alienation of quasi-essence, and the alien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collectively foster the spiritual condition of “passive o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the self-objectification narratives young people engage in through “Malo” discourse are both a product of the dissolution of systematic self-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alienation and a symbolic resistance against mainstream success studies.

Keywords

Sun Wukong, Hero, Passive Object, Self-Ident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青年人的精神图景往往会通过文化符号体现出来,作为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核心意象,孙悟空形象在媒介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从“神话原型”到“世俗化镜像”的演变。1986年电视剧将其固化为集体记忆中的反抗者典范,而当代网络语境中的“吗喽”形象则通过“偷生幸存者”与“压抑性狂欢”的悖论式存在,揭示了青年群体在风险社会中的心理调适机制。这种认同落差(从“齐天大圣”到“山林野猴”)恰是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性冲击下发生意义漂移的典型案列,其背后折射出价值体系从宏大叙事向微观生存的认同跌落。而这种认同跌落反映出的是从反抗权威、掌握命运的英雄象征,到自嘲为“吗喽”的渺小、无力、被支配的被动客体的精神状态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的是深刻的主体性危机:从追求自我实现到被动接受工具化生存。本文将从劳动异化的角度,剖析当代青年人主体性消解的内在机制。

2. “英雄主体”的文化内涵与劳动本质的关联

2.1. “英雄主体”的象征解读

正如海伦·莫拉莱斯所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神话,并不在于他是否活过,或者活得好不好,而在于他是否超越生活……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时代精神,代表了人们的幻想”[1]。自1986年央视版《西游记》开启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孙悟空”形象始终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镜像存在,其符号内涵的嬗变轨迹与改革开放进程形成深度互文。初代影视文本中的“斗战胜佛”原型,被赋予了80年代特有的改革者人格特质;而1995年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在世纪之交的网络文化再生产中,经由高校BBS的知识精英阐释,完成了从“商业失败品”到“后现代经典”的符号跃迁。这一转型揭示着理想主义话语在消费社会中的解构机制:当齐天大圣的“三无”特质(无宗法束缚、无道德枷锁、无终极归宿)遭遇互联网时代的价值虚无,其主体性神话便裂变为“天真即无能”与“英雄必虚伪”的二元悖论。当《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孙悟空伴随着《小刀会序曲》再次出场时,当《悟空传》中孙悟空不再依靠女娲石而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抬起金箍棒时,当《黑神话:悟空》中孙悟空历经艰险、脱胎换骨拿下紧箍咒时,英雄归来的讲述使英雄主体的内涵有了形象体现[2]。这里“主体”有两个意思:通过控制与依赖服从于他人和通过良知与自我认知将他拴在他自己的身份之上[3]。

2.2. 劳动:人之为“英雄”的本质活动

马克思曾说过:“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体现。劳动应是体力和智力的自由发挥,

是目的本身。”[4]“英雄主体”的精神内核包含典型的能动、创造、价值特质，正是理想劳动状态(自由自觉状态)在精神文化层面的投射。也就是说，劳动是实现“英雄”潜能的现实基础。

在自由劳动中，个体通过对象化活动将本质力量外化于产品和成果，并在其中确认自身价值，形成积极、稳固的自我认同。这与“英雄主体”的“我是创造者，我是自身命运的主宰者”的观念具有重合性。

“齐天大圣”作为前工业时代的劳动乌托邦象征，承载着未被异化的主体性理想。其大闹天宫的叛逆宣言，本质上是马克思“自由自觉活动”的映照，划破了等级秩序对劳动自主权的禁锢。当取经路上的降妖除魔被孙悟空视为通关的游戏，劳动本身便升华为体能与智力的挥洒，而非资本逻辑下的痛苦消耗。最终“斗战胜佛”结局所昭示的，正是劳动价值在共同体中的确证。这种英雄叙事，构成了前现代劳动范本的精神图腾。然而在当代符号的演变中，金箍棒异化为 KPI 报表下的柱状图，“齐天大圣”从便从具有主体性的英雄坍缩为“吗喽”自嘲的废墟。

3. 劳动异化导致人的异化：自我认同危机的产生

“吗喽”的自我矮化，并非凭空产生的文化怪诞，而是其生存境遇在意识层面的真实投射。要理解这一符号，就必须深入到当代青年所处的劳动过程、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环境中去。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劳动异化现象由来已久，且伴随时代的演进不断加剧。步入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人们为了换取维持自身基本生存与发展的生活必需资料，不得不将自身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作为劳动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并没有挣脱其固有束缚，“反而使自身深陷愈加精密的隐形囚笼，沦为数字资本的劳动机器”[5]。异化劳动并没有消除，而是相比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当代以数字劳动为主的时代的异化劳动表现得更为隐蔽、更加深化。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的四重表现。当代青年的“吗喽”处境，正是这四重异化的生动写照。

3.1. 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

(1)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自己越贫穷；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统治工人。劳动者无法占有、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丧失了对自身创造力的直观确认。劳动成果不再体现其本质力量，反而成为压迫其的力量。“英雄”通过成果确证价值，而异化使劳动成果与劳动者疏离，导致了“我做的东西不属于我，也不能代表我”，使自我价值感被掏空，从“创造者”沦为纯粹的“生产者”。

(2) 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

劳动对工人是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劳动是被迫的强制劳动，是满足劳动以外需要的手段。在劳动中，工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6]。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地创造，而是被强制、被控制、被规训的过程。“英雄”的自由意志和反抗精神被系统性地压制，被迫服从于外部指令和流程。行动沦为被动接受，“七十二变”的创造力便无用武之地。劳动仅仅沦为谋生手段，丧失了作为目的本身、满足发展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意义。“干活”只是为了活着。“英雄”追求的价值实现被彻底异化。

(3) 劳动者与人类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活动，是最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行为，自由与创造力是人的类存在，但资本主义的劳动却消解了工人的自由与创造力。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性人类的本质活动，也就是人类自由和创造性活动的源泉本应该是劳动，但是劳动已经异化为资本主义社

会里的工具，它只是一种生存工具。人丧失了人的本质，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在以数字化为主要的时代，劳动的社会本质在价值论方面通过数字中介发生了质的转变，数字技术虽然扩展了劳动的社会联系，但这种联系是被技术所中介的形式化关系，而非真实的社会关系，劳动的社会本质被符号关系所取代，导致价值生成过程的异化。存在论层面的异化为认识论异化提供了客观基础，认识论异化又通过主体实践强化了价值关系的异化，而价值关系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存在本质的进一步丧失。劳动者存在本质的丧失又进一步导致了其主体性的削弱甚至丧失[7]。

“英雄”身份作为人的最高潜能实现被消解。个体被降格为仅需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人力。从追去卓越的“人”退化为求生存的“吗喽”，这是“吗喽”自嘲的深层根源。“类本质”的异化意味着人被困在“维持肉体生存”的层面，丧失追求更高层次发展的空间和动力，认同停留在“苟活”层面，“英雄”也不再追求超越性目标。

(4) 劳动者同他人相异化

劳动者不仅与自身、产品、类本质对立，也必然与他人处于对立、竞争、利用的关系中。“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4]“英雄”往往存在于共同体,比如说师徒、团队,并获得认同。在异化劳动下,人际关系工具化、竞争化,难以建立基于互助、信任、共同目标的认同,而加剧孤独感和原子化的“被动客体”感。他人不再是潜在的认同来源,而是潜在的威胁。“英雄”的协作精神与正义感被扭曲。

简而言之,生活在数字时代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失去了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的机会[8]。劳动者的工作内容被严格限制在固定的操作流程中,从而导致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和个性化的主体表达被削弱,造成个体主体性的丧失。

3.2. “被动客体”的本质：自我认同的消解

劳动异化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核心理论[4],通过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的剥削本质,同时也阐明了自我认同危机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在《手稿》中,马克思凭借自身独特的理论视角,一方面阐明劳动构成了人的本质属性,深入揭示了劳动在个体实现自我认同过程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借助劳动异化理论,深刻剖析并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自我认同被消解的根源所在。

异化劳动致使劳动偏离了其作为实现主体人自由本质活动的轨道,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丧失了自主性,劳动异化为一种与主体相对立的异己性力量,具体呈现为劳动与劳动者自身的对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只被理解为赚钱的工具,使得自由自主的人被贬低为手段。劳动异化现象会进一步引发人的异化问题。在异化劳动的情境之下,人们难以从劳动过程中获取对自我价值与意义的切实确证。从现实层面来看,人的异化具体呈现为个体自我的异化以及自我的全面丧失。当具备反省能力的个体深刻体验到这种自我丧失时,便会引发自我认同层面的危机。

“自我”这一哲学范畴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作为人的“类可能”的“自我”,二是作为“人的个人可能”的“自我”。前者涉及的是“自我”的一般本性,后者则涉及的是“自我”的一般本性,后者则涉及个体存在的意义,是关于“我是谁”的问题。“自我”的这两个层面相互关联,一般性的“自我”不能不和经验的个人相联系,而“我是谁”这一内心的、个人的探索,也必然对人的本质和可能的理解相联系[9]。自我认同作为对“自我”反思性的认识,是个体对于自身存在具体意义和价值的确证,而这无疑对“自我”一般本性即人的本质的理解与统一。马克思主义劳动观阐明劳动是人的本质所在,正是在劳动中人们实现对自我价值的确证,实现自我认同。丧失劳动权利的人是不幸的,劳动的异化导致人的异化,最终导致个体自我认同的丧失。

青年使用“吗喽”自嘲，初衷是为了对抗外部压力，保持自我的清醒。但这一行为本身，却可能在不经意间完成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最终认同。当一个人反复自称“吗喽”，这种语言便不再仅仅是描述，而是一种持续的自我宣告和身份建构。

4. 异化现实中的青年精神图景：从“齐天大圣”到“吗喽”

在数字时代，知识生产者生产代码、方案、内容，其成本归属于资本平台和公司，劳动成果与创造者的割裂空前尖锐，劳动产品作为异己力量统治劳动者。在异化结构中，传统而“英雄”仿佛失效，个人的奋斗难以突破系统性束缚，“成功学”叙事破产。中国青年的现实“成像”也因此在这鸡犬和鸡血的两极间反复横跳，一极是反抗权威、追求自由的“齐天大圣”，一极是自嘲躺平、消极被动的“吗喽”。

从文学到影视、动漫等多种媒介，孙悟空的形象不断被重塑和创新，但其核心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却始终保持不变。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孙悟空形象本身，更体现在其背后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10]。“齐天大圣”的勇敢、智慧、忠诚和反叛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主义、道家哲学和民间信仰等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英国 BBC 制作的北京冬奥会宣传片，全片以孙悟空破石而出为始，以其在鸟巢体育馆举起火炬作结，明确地将孙悟空表述为“中国崛起”的象征。齐天大圣武艺高超，大胆洒脱，悟空的洒脱来源于底气，也来源于他的真才实学，他觉得自己足以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努力改变命运”的齐天大圣式承诺，在学历贬值面前仿佛苍白无力，个人异化无法突破系统性异化的铁笼。

“吗喽”最开始是以表情包的形式走红网络，比如在公司“偷水”、“偷卫生纸”，形象地表述了打工人的精神胜利法——上班固然无趣，但至少靠“偷”公家的资源占到了便宜，从而扳回一局。这个表情包还有一个“癫狂系列”，里面的猴子要么在泼水，要么在打人、打猴，要么就手舞足蹈，总之没有逻辑可讲，主要帮助当代青年人宣泄“想发狂但不敢”的委屈。

从“齐天大圣”到“吗喽”的精神图景变化，是在系统化异化下的一种自我认同的消解，青年人难以建立基于自由创造、价值实现、社会贡献的积极、稳定的自我认同(我是谁？我的价值何在？)。“吗喽”认同是一种消极性甚至带有自我否定色彩的认同，是异化状态下自我认同扭曲和贫瘠化的表现，是主体性消解后的精神剩余物。“齐天大圣”的反抗是砸碎凌霄殿，当代“吗喽”的反抗是把自己缩进香蕉皮里，换个角度来看，当青年在自嘲中积蓄清醒认知，新的主体性在劳动解放中获得重生也有了可能。从“齐天大圣”到“吗喽”的符号沉降，清晰地勾勒出一幅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青年精神图景的变迁轨迹。这幅图景的底色，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普遍异化现实。曾经代表着反叛权威、追求绝对自由的“齐天大圣”精神，在异化劳动的铁笼、绩效社会的“五指山”和消费主义的甜蜜陷阱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困境。

“吗喽”这一自我指涉的迅速风靡，绝非简单的网络流行语更迭，而是承载着极为沉重的社会心理学意义。它精准地捕捉到了年轻一代在宏大叙事消散后所面临的集体性身份焦虑，以及为应对这种焦虑而发明的独特文化防御机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这一现象正是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主体性异化的鲜活症候。

更为深刻的是，“吗喽”身份认同巧妙地化解了主流成功学话语施加于个体的象征性暴力。在一些理论中，个人的成败完全被归因于自身努力与否，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被巧妙地转化为个体的责任。面对这一套苛责性的逻辑，青年们以“吗喽”自居，实则完成了一次无声而犀利的反驳。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的四个规定性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系统地解释了“英雄主体”向“被动客体”蜕变的内在机制，最终导致了青年自我认同的消解，表现为“吗喽”式的精神困境。从“吗喽”式的困境回溯劳动异化理论，其深刻性在于揭示了，主体性的实现绝非纯粹精神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

劳动解放和社会改造在当代青年的话语体系中。因此，“从‘大圣’到‘吗喽’”的符号变迁，是一幅意味深长的精神地形图。它记录了一代青年从仰望星空、相信能“大闹天宫”的英雄主义，跌落到脚踏实地、自认“芸芸众猴”的现实主义的心理轨迹。这幅图景中，既有面对高压现实的清醒与无奈，也蕴含着一种以退为进、拒绝被主流话语收编的微弱抵抗，更警示着个体主体性在系统性压力下日渐消融的深刻危机。理解这一复杂图景，是探寻超越“吗喽”困境、重建积极健康青年认同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 [1] Morales, H. (2007) *Classical Myth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trade/9780192804761.001.0001>
- [2] 孙晶茹. 英雄归来: 21 世纪中国新神话的主体之思[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2): 159-168.
- [3] Faubion, J.D. (2001)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3: Power* (Translated by Robert, H.). New Press.
- [4] 马克思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5] 吴承恩. 西游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51.
- [6] 刘卓红, 郭晓晴. 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批判性考察[J]. 广东社会科学, 2022(5): 48-58.
- [7] 孙博. 数字时代的劳动价值观: 异化与重构——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J]. 西部学刊, 2025(15): 76-79.
- [8] 刘修岩, 徐邵军. 数字经济发展、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报酬份额提升[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122-136.
- [9] 科恩, 著. 自我论[M]. 佟景韩,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6: 39-40, 122-136.
- [10] 贾国庆. 异类的悲剧: 孙悟空形象的心理和文化分析[J]. 绥化学院学报, 2015, 35(12): 31-34.